

理论学习参考

2021年第9期

(总第95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专刊(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宣传部编

2021年4月11日

目 录

【党史知识】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大事记 1

【重温经典】

重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

学习《常委会的工作方法》 32

“三大法宝”为什么灵验 43

【党史研究】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 48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如何提出来的 55

坚持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制胜法宝 5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经历的磨难与挑战 62

【重要论述】

党史上的这一周(4月5日至4月11日) 68

编者按：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整理汇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系列专刊，供学习参考。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大事记 (1919-1949年)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历史内容非常丰富，浩如烟海，我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时间、地点、事件、简介四个部分作了归纳，方便理清历史的脉络，把握重大事件。

一、五四运动

时间：1919年5月

地点：北京

简介：1919年5月4日，北京的爱国学生开展了集会、游行、罢课等活动，反对北洋政府准备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得到社会各界广泛支持，最终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并取得了胜利。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二、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

时间：1920年8月

地点：上海

简介：1920年春夏之交，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多次召集会议，商讨建党问题。1920年8月，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推选陈独秀为负责人，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

三、中共一大

时间：1922年7月

地点：上海

简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大会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区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制定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文件。

四、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时间：1923年2月

地点：京汉铁路沿线

简介：亦称“二七大罢工”。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沿线三万多工人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总同盟罢工。7日，吴佩孚派军队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影响。

五、中共三大

时间：1923年6月

地点：广州

简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至20日在广州举行。大会讨论并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以及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性的决议案，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打下政治基础。

六、国民革命

时间：1924年1月-1927年7月

地点：全国

简介：国民革命，也被称为大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 1924 年 1 月至 1927 年 7 月之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战争。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1927 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清共”，国共合作破裂。

七、黄埔军校建立

时间：1924 年 5 月

地点：广州

简介：在苏联帮助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于 1924 年 5 月在广州黄埔创立（即黄埔军校）。孙中山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许多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11 月，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健全政治工作制度。

八、中共四大

时间：1925 年 1 月

地点：上海

简介：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5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在上海举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会议。大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

九、五卅运动

时间：1925 年 5 月

地点：上海

简介：1925 年 5 月 30 日，英帝国主义巡捕在上海开枪屠杀游行的学生和群众，造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这一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和罢市，形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

十、省港大罢工

时间：1925 年-1926 年

地点：香港、广州

简介：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此次罢工由共产党人邓中夏及苏兆征领导，历时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大罢工之一。省港大罢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十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

时间：1925年12月

简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从而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十二、中山舰事件

时间：1926年3月

地点：广州

简介：也被称为“三二〇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蓄意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十三、北伐战争开始

时间：1926年7月

地点：广州

简介：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至11月，基本消灭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势力。在北伐战争中，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英勇善战，屡破强敌。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共产党领导的湘鄂赣等省工农运动蓬勃发展。

十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

时间：1927年3月

简介：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十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时间：1927年4月

地点：上海

简介：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导致国民革命被迫中途夭折，成为国共十年内战的开端。

十六、中共五大

时间：1927年4月-5月

地点：武汉

简介：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等文件，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

十七、马日事变

时间：1927年5月

地点：长沙

简介：1927年5月21日晚，驻守长沙的武汉国民政府辖军，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率叛军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民讲习所等中共控制的组织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员、中国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杀害。事变后，许克祥与中国国民党右派继续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这次事变为“马日事变”。马日事变是湖南的大革命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转折点。

十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时间：1927年7月

地点：武汉

简介：四一二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日趋反动。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分共”，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表明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被国民党完全抛弃。政变表明，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已没有分歧。

十九、土地革命战争

时间：1927年-1937年

地点：全国

简介：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二十、南昌起义

时间：1927年8月

地点：南昌

简介：1927年4月-7月，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立革命军队的开始。

二十一、八七会议

时间：1927年8月

地点：汉口

简介：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陈独秀中共中央局书记职务，选举瞿秋白、

李维汉、苏兆征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二十二、秋收起义

时间：1927年9月

地点：湘赣边界

简介：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卢德铭等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边界领导工农革命军举行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中及时作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决定，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十三、三湾改编

时间：1927年9月-10月

地点：江西

简介：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进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这是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开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从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建设一支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二十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时间：1927年10月

地点：江西

简介：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建立起红军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二十五、广州起义

时间：1927年12月

地点：广州

简介：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经三天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二十六、井冈山会师

时间：1928年4月

地点：江西

简介：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井冈山会师后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对巩固扩大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十七、中共八大

时间：1928年6月-7月

地点：莫斯科

简介：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二十八、古田会议

时间：1929年12月

地点：福建

简介：1929年12月28-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多种决议案，这些决议案系统地解决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二十九、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时间：1931年9月

地点：瑞金

简介：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4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红军决议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抗日宣言、少数民族问题决议案、红军优待条例、婚姻条例等法律、法令、条例、文件。

三十、取得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时间：1930年-1933年

地点：江西、福建

简介：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

三十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

时间：1933年-1934年

地点：江西、福建

简介：从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三十二、长征

时间：1934年-1936年

地点：经过江西、贵州、四川、陕西等14个省份

简介：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三十三、湘江战役

时间：1934 年

地点：广西

简介：1934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 8 万多人锐减至 3 万余人。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

三十四、遵义会议

时间：1935 年 1 月

地点：遵义

简介：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在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三十五、四渡赤水

时间：1935 年 1 月

地点：川贵边界

简介：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王稼祥将军、朱德将军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

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三十六、巧渡金沙江

时间：1935年5月

地点：长江上游

简介：1935年4月28日，蒋介石下达命令，控制金沙江渡口，毁船封江。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如果红军不能渡过，就会被国民党军压进深山峡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1935年5月3日至9日，红军避敌锋芒，仅凭7只渡船在7天7夜间，2万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三十七、强渡大渡河

时间：1935年5月

地点：四川

简介：1935年5月，中央红军到达四川省石棉县，准备渡过大渡河。而国民党军也在这里布置了重兵，企图将红军消灭于大渡河以南地区。5月25日凌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线指挥，孙继先率领“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突破了敌军的防线，为红军北上打开了一条通道。不过，当时河边只有几只小船，无法在短时间内把红军全部运送过河。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决定开辟第二个通道，就是离此地240里的泸定桥。

三十八、飞夺泸定桥

时间：1935年5月

地点：四川

简介：1935年5月29日，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在王开湘、杨成武的指挥下，红四团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最终成功夺下了泸定桥。22名勇士中，有4人牺牲，18人幸存。

三十九、一二九运动

时间：1935年12月

地点：北平

简介：一二九运动 又称为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的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四十、瓦窑堡会议

时间：1935年12月

地点：陕北

简介：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等十余人。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四十一、西安事变

时间：1936年12月

地点：西安

简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同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四十二、洛川会议

时间：1937年8月

地点：延安

简介：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

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

四十三、平型关大捷

时间：1937年7月

地点：山西

简介：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由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伏击战，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战大捷。该战有力配合了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四十四、第二次国共合作

时间：1937年-1946年

简介：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四十五、《论持久战》的发表

时间：1938年5月-6月

地点：延安

简介：《论持久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1938年7月首次出版。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国民党内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该著作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是指导全国抗战的理论纲领。

四十六、《新民主主义论》发表

时间：1940年1月

地点：延安

简介：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于 1940 年 1 月 9 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 1940 年 2 月 15 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

《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四十七、百团大战

时间：1940 年 8 月-1941 年 1 月

地点：华北地区

简介：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的战役，由于参战兵力达 105 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重击了日伪军的反动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

四十八、皖南事变

时间：1941 年 1 月

地点：安徽

简介：1941 年 1 月 4 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 9 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北移。1 月 6 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 7 个师约 8 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 7 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少数突围外，大部牺牲或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

四十九、延安整风运动

时间：1941 年-1945 年

地点：延安

简介：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至 1945 年 4 月 20 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确立了一条

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五十、中共七大

时间：1945年4月

地点：延安

简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七大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五十一、抗日战争胜利

时间：1945年9月

地点：全国

简介：抗日战争是在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抗战时间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结束，共14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五十二、重庆谈判

时间：1945年8月-10月

地点：重庆

简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五十三、解放战争

时间：1946年-1950年

地点：全国

简介：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1946年6月至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战争摧毁了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

五十四、孟良崮战役

时间：1947年5月

地点：山东

简介：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于1947年5月13日至16日由毛泽东指示，陈毅、粟裕指挥，在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东南孟良崮地区对国民革命军整编第74师进行的进攻作战。孟良崮战役是一场山地运动歼灭战，该战役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一举扭转了华东战局，是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重要转折点。

五十五、“十大军事原则”提出

时间：1947年12月

地点：陕北

简介：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全文593个字，毛泽东用精辟的语言，把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原则讲得十分清楚。人民解放军灵活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瑰宝，彻底打败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

十大军事原则，标志着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理论的日臻完善，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五十六、三大战役

时间：1948年9月-1949年1月

地点：东北、华北、华东

简介：三大战役是指 1948 年 9 月 12 日至 1949 年 1 月 3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场战略性战役。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五十七、七届二中全会

时间：1949 年 3 月

地点：河北

简介：又称西柏坡会议，于 1949 年 3 月 5 日—13 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主持了此次会议。会议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并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七届二中全会为党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五十八、渡江战役

时间：1949 年 4 月-6 月

地点：长江中下游

简介：渡江战役是继三大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中下游强渡长江，对国民党军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行动。此役共歼国民党军 43 万多人，解放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并于 4 月 23 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束。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之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五十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时间：1949 年 9 月

地点：北平

简介：1949 年 9 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这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事宜的会议。会议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制定

了总原则。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六十、开国大典

时间：1949年10月

地点：北京

简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北京天安门举行，被称为开国大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内蒙古日报》官方微信 2021年3月17日）

重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摘要：在国民党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情况下，为系统地表明中共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通过对近二十年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与提炼，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但为人们描绘了中国未来的蓝图，看到未来的希望，更重要的是为中共在抗日阶段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同年2月20日，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全文发表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期、第99期合刊上。这篇文章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一个伟大理论成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地找到了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今天重读《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对于我们认识理论武装的重要性，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都有重要现实启示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论》发表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自觉地承担着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重任。随着革命斗争的展开，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如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应当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在革命中有哪些同盟军可以争取？怎样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准确回答，以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曾作出了许多努力。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初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从而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

的革命纲领。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再次重申：“中国革命现在阶段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的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

这些事实表明，中共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已初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应该看到，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还是初步的。而且有的问题虽然提了出来，但并未很好地以之指导实践，如中共四大尽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如何去取得却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政权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也没有引起大会的足够注意。这不能不说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同样，中共六大虽然强调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中国革命仍属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派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使得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存在的“城市中心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等错误认识并未纠正。20世纪30年代初，党内还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由此可见，要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道路和前途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总路线，形成一套完整的革命理论，并以此指导革命斗争的实践，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固然有其复杂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讲都是中共自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没有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主张，搬用的还是俄国革命的经验，举起的也是俄国革命所用过的“苏维埃革命”旗帜，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在当时的条件下，犯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它说明中国革命走自己的路的极端重要性。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标志着教条主义在中央统治的终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实际，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主张。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共从原来遭受国民党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作了重大政策调整，公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并且明确提出“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这说明，中共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举起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旗。

中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诚心维护的，但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共政治影响的扩大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基于其一党专政的理念，除了在军事上制造反共磨擦外，还不断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国民党所谓“理论家”叶青公开声称：“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蒋介石于1939年9月发表一篇题为《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文章，鼓吹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作为中间党派的国家社会党首领张君勱也在1938年12月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提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共必须对此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39年底到1940年初，毛泽东在进一步总结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接连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它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不仅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系统地提出并阐明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是偶然

的。遵义会议之前，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理论的不成熟，不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不懂得国情不同，革命的性质、对象、依靠力量和方式诸多方面也必不相同，而常常机械地套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来毛泽东在回顾中共的历史时，曾这样讲道：“如果有人问，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他还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到毛泽东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时的中共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十多年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了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因而到了这时“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所以，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共已经有了真正属于自己创造的理论体系，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它亦表明中共的理论源自于马列主义，但绝对不是马列主义的简单复制，而是创造性的发挥和发展。尽管新民主主义这个名词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发明的，但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无疑是中共的独创，是毛泽东对近二十年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与提炼。从此，中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旗帜，再也不需要搬用苏维埃革命的旗帜，也不必借用

三民主义的旗帜。

二、《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尚未取得根本性胜利，革命仍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课题。因此，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道路、前途诸问题，无疑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讨论的重点内容。

在事关中国革命的各种理论问题中，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中期，中共之所以多次出现“左”右倾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中国的国情缺乏科学的分析，没有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而也就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

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他曾说，我们在这里革命，就要先知道这里的情形，好像到台上去唱戏，不了解戏台上的情形就唱不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中国原本是一个封建社会，“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正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然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激化，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这就是中国革命深刻的社会根源。近代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断爆发，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基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斗争极其尖锐化的结果。

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不仅成为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性质。那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民主。这两大任务又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既是反帝的民族革命，又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统一。这种革命，从性质上讲，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为此，毛

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解释：“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因为中国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所以资产阶级不能视为革命的对象，更不能像苏维埃革命时期那样，将民族资产阶级等所谓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而应当作为可争取的同盟者去团结。而具体政策的制定上，对于城镇的私人资本主义就应当采取允许与鼓励其发展的方针，对于农村的富农就不应当将之与地主同样看待，而应当允许富农经济存在。

但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以往的革命又有了根本的不同，它“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以往的民族民主革命则可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种性质特征，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即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决定了不能笼统地将本国的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而应当将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分，前者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是革命的对象之一，后者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又有妥协动摇的可能，因此对其必须采取慎重的政策；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还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由此进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么，实现这样的前途需要怎样的步骤，能不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来一个“毕其功于一役”，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为这两种做

法都是错误的。为此，他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并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

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下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已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能插入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而是当条件成熟时，必然自觉地将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些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对中国共产党人当下的任务与未来的目标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大革命之所以失败，中共在国共关系破裂之时之所以处于被动地位，就在于从指导思想上没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主人看，而是当成了国民党的苦力，是为国民党打工与帮工的。因为在中共当时许多人的思想认识里，国民革命的结果，并不是建立一个中共起主导作用的政权，而是要建立国民党即资产阶级为领导地位的政权，这个新政权建立后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壮大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中共再领导工人一举发动一场十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暴动，从国民党手中取得政权。在资产阶级革命没有成功之前，无产阶级应当从属和服从资产阶级，中共是为国民党作配角的，自然要迁就国民党而不能去刺激更不能得罪国民党。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提出，尽管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无产阶级即中国共产党应当在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由资产阶级占领导地位的政权。同时，当下的中国革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不能将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即是说，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参与革命的各个阶级的联合政权。

三、《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毫无疑问，毛泽东所设想的新中国，首先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正式提出。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他在 1941 年 5 月写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文中说：“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有些人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943 年 8 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又说：“以前各国的那种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发动群众不彻底，生怕群众觉悟起来，超出资产阶级控制的范围。我们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破坏了封建秩序，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迫，而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种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社会形态，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它最终的前途只能是走入社会主义。这些重要理论观点，不仅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也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未来的前途。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说：“在毛泽东作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时，我在延安已经生活了半年多。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不一样的社会。但这是个什么性质的社会呢？叫什么名称，大家没有想过。毛泽东未讲之前糊里糊涂。”《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人们终于明白，延安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不但提出了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而且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政权形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那么，各个革命阶级如何联合专政，这种联合专政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后，中共在自己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的原则，成为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具体形式。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正式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主张。所谓“三三制”，就是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和各级参议会中，共产党员（无产阶级）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占三分之一。

为什么要实行“三三制”这样的政策？毛泽东也曾作过这样的解释：“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办好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

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中共不但提出了“三三制”原则，而且模范执行这一原则。依据“三三制”原则，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共产党员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共产党员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十八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中共人士递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出的九名常驻议员，共产党员也刚好为三名。在 1941 年乡级参议员的选举中，据陕甘宁边区安塞、绥德、吴堡、米脂、合水、镇原、环县、新宁等八个县的统计，共产党员所占比例最高者合水县为 29.4%，最少者绥德为 13.8%，八县平均为 20%。李鼎铭先生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边区的性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他还为边区的发展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著名的精兵简政主张就是他提出来的。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主张，一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二是“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设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城市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农村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城乡都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其主要的着眼点，就在于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当城乡资本主义对中国生产力发展还有积极作用的时候，就不应当将之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加以消灭。这样一来，共产党人就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剥削的问题。对此，张闻天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1942 年 10 月，张闻天在对晋西北和陕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发

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其中指出：“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体贴农民疾苦，这是对的。但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配别人的财富上，则是不对的。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达，工人生活比今天中国小地主好得多，可见落后国家的地主，日子过的不如先进国家的工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之下，只要资本主义发展了，工人生活一定会改善。”当然，新民主主义社会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并不是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是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壮大新民主主义的物质基础，并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条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区别于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地方，首先和主要的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以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亦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的。当然，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作指导，并不是要求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与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不加区别地等同起来。在这个阶段，“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又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文化”，就是从这种新文化的内容来讲，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这是一种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和解放，提倡民族自信心的文化。所谓“科学的文化”，“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是一种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所谓“大众的文化”，是指这种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是一种“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

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是民主的文化。它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主张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

四、余论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其《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说过，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意义和影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它的‘建国大纲’和政治纲领”，这个评价是比较贴切的。历史学家李平心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也曾说：“‘新民主主义’口号的提出，在今天显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上上月间看到了一则印刷模糊的通讯，其中刊出了当代一位大政治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提要，不禁喜狂，因为在简短的提要中，已经闪耀了演讲者天才的光辉，发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理”。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理论的国民党文人叶青后来也说：“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那时他叫出‘学习’底口号，想‘认真学习一点东西’。两年以后，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民主主义”这样的概念，是经典作家的著作本身所没有的，这个理论所阐释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在其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实现了中共思想上的真正解放和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之前，毛泽东也曾在抗战爆发前后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理论文章，但那些文章基本上是对苏维埃革命后期经验教训的总结；抗战爆发后又发表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这些文章主要回答的是如何坚持长期抗战的问题。至于中共在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在新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建国方略和方针政策，许多人还不是很清楚。新民主主义理论则十分清楚地回答了人们的关切，它告诉全国人民，中共现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直接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就为人们描绘了一副清晰的革

命路线图。这不但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划清了界限，也明确告诉世人，中共不主张苏联式的苏维埃革命，而是要走一条独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个革命的参加者十分广泛，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之外，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还包括作为地主阶级一部分的开明绅士，这也使中共领导的革命从狭隘的工农革命中走出来，成为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从而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

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但为人们描绘了中国未来的蓝图，看到未来的希望，更重要的是为中共在抗日阶段应当采取什么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抗日政权问题上的“三三制”原则，经济上的减租减租、合理负担和发展资本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都使中共在抗战时期所采取的政策与苏维埃革命时期有了极大转变。这些政策尽可能照顾到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有利于争取广泛的同盟者。与之相对照的是，国民党虽然高唱三民主义，高喊“抗战建国”，但其三民主义究竟与各阶级阶层有何关系，能体现各阶级阶层什么具体利益，人们无法感知到，三民主义仅仅成为一个口号，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图腾，根本起不到凝聚人心作用。至于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人们更是不清楚，实际上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在许多人看来，抗战毕竟关系民族的存在，大家都有责任，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建立的新国家，却不会带来更好的未来。这也是随着抗战的持久进行，中共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同情，国民党却日渐失去支持的重要原因。

（作者：罗平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毛泽东研究》 2015年第三期）

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加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建设的通知》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的深刻意义，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纳入“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重要内容。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2月25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我感到在当前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重温毛泽东同志这篇著作、学习掌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总结讲话的一部分。当时，全国革命已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即将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一个掌握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充分认识到这是党的一个历史性关节点，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面对新的任务、新的问题，“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他形象地把入主北京比喻为“进京赶考”。能否考及格，能否不当李自成，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能否保持并进一步发挥党的正确领导。而要发挥正确领导作用，作为各地区各领域最高领导机关的党委会，能否运用科学正确的工作方法乃是关键中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工作方法。早在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就形象地打过一个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打败国民党后，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从未趟过的一条“大河”。能否安然过去，“桥或船的问题”至关重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为全党准备的“桥或船”。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十二条重要工作方

法，总字数不到三千，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它们既是对以前党的工作方法的总结，又是面临新问题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关于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核心内容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第一、二、三、四、十条，讲的都是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方法。党委会本身就是一个实现民主的机构，其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即是充分地实现党内民主。

体现民主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少数服从多数，党委会中书记和委员之间就是这个关系。“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但是，这个“班长”不同于军队的班长，最大的不同是要坚持民主的原则。书记要当好“班长”，即是要善于发挥各委员的作用，加强集体领导。正如他在七大上曾说的：“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1948年9月，他还为中央专门起草过一个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其中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

党委制设立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防止个人说了算。后来，他曾尖锐批评党委领导中的个人独断。“听说现在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人说了算就算数的道理呢？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其实，容纳和接受批评，是发扬民主的另一个重要方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物要不犯错误，关键是要善于听取和采纳各方面特别是反对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营造批评的环境是促使党的政策正确的一种工作方法。1960年12月，毛泽东同志向人讲，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为了让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多次引用过历史故事。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一采纳了酈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二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三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四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刘邦能够作出一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领导者如果对“不同意见”和“批评”无动于衷，就等于失去了鉴戒之境，迟早会犯错误。

党委会是一个领导集体，这个集体必须团结、和谐。在毛泽东同志心目中，集体决策、分工负责是党委会的一个根本原则。“班长”和委员之间要能真诚沟通、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日常工作中，“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背后议论”，“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加强沟通、彼此尊重、密切协作、步调一致，既是党委会工作的要求，又是实现集体领导的必要途径，更是保障党的团结的基本规矩。

对于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同志还有另一个说法，即多谋善断。多谋就是民主，善断就是集中。他多次谈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在1959年3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他说郭嘉给曹操出了很多好主意，如打吕布、打袁绍、打袁绍的儿子袁谭和袁尚，都取得胜利，曹操称道郭嘉：“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郭嘉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如果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195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讲道：“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这很像许多古人都说过的：“谋之以众，断之以独，疏之以导，策之以励。”

在党委会中，无论是民主还是集中，书记即“班长”的作用非常突出。能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关键要看书记的素养如何。所以，书记应该很好

地进行学习和研究，特别是向下级学习。“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充分尊重、吸纳下级意见，是民主方法的一个重要体现。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经常向下级学习，是保证决策正确的一个重要方法。

关于“弹钢琴”与胸中有“数”

领导者不同于一般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面对各种复杂的工作，毛泽东同志提倡党委的同志要学会统筹兼顾，对此他形象地称之为“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和相互转化的。因此，在工作方法上不能顾此失彼。

毛泽东同志是“弹钢琴”的高手。民主革命时期，他往往一方面强调中心工作是军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号召做好其他一切革命工作。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上，他说：“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

特别是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随着毛泽东同志领导职务的变化，他面临的工作也越来越多，比如思想政治工作、政权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宣传工作、党的建设、统战工作、对外工作，等等。毛泽东同志基本上都能做到有条不紊，齐头并进，“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轻松自如。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善于“弹钢琴”。

“弹钢琴”要注意细节，一个音符错了，整个曲子也就砸了。毛泽东同志往往给人挥斥方遒、气势磅礴的感觉，其实他是非常注重细节的。在指挥一场战斗之前，甚至战士碗里有没有肉，他也要关注和嘱咐。现在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毛泽东同志的成功，与其既能挥舞大棒又能绣花针，不无关系。

学会“弹钢琴”，不但要心中有“谱”，而且还要胸中有“数”。钢琴有多少键，每个键能弹出什么音符，必须了如指掌。解决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别是要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字。毛泽东同志把胸中有“数”也列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因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胸中有“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成绩和缺点有数。“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当然，即使取得了十分的成绩，也不能骄傲，“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历史上有很多因骄傲而失败的例子。所以，在党即将取得全国性政权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同志清醒而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关于一定要“抓紧”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党委对该做的工作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一位老一辈中央领导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自己“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

怎样抓得紧呢？工作布置下去，不能认为就完成了。毛泽东同志说：“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其中，“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一年至少检查四次”。通过检查，督促进展，修正错误。1948年2月，他在谈到工商业政策的时候说：“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干到底，直到真正见成效才能罢休。

发扬民主和“抓紧”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开好各种会。党委会行使职责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开会。党的各级机构和各种组织，“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日常工作中，“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

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

这是不好的。“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开会时，不要照本宣科，充分发挥参会人员的作用。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此间，讲话、演说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每次会有一个主题，其他问题也吹一下。开会的时候吹吹闲话，引起兴趣，接触问题。”

对于各级党委来说，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通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划清两种界限”是要害。在毛泽东同志看来，“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西安还是延安？”不懂得划清这种界限，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正如他指出的，国民党的官僚主义和共产党干部偶尔会犯的官僚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我们不是从在党言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在党护党的立场上，辩证分析我们党员干部中出现的官僚主义，而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一无是处，那就完全站在了党的对立面，成了一种资敌行为。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委“一班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高度的自觉。

毛泽东同志写《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走向成熟，即将掌握全国政权，形成了一整套正确有效的工作方法。因此，这十二条方法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要求，又体现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方式。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虽然我们党的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历久弥新，对于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学习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学习掌握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学习时报》 2016年2月29日）

附：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领导很大的地区，担负很繁重的任务。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当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是一个比方。

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过去大家不注意，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在这方面大有进步，友好团结关系大大增进了。今后仍然应该不断注意。

三、“互通情报”。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¹⁾，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现在党内的语言比较一致了，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对什么是“中农”和什么是“富农”，就还有不同的了解。

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²⁾，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

五、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六、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七、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

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十二、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3)？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

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

【注释】

（1） 见《老子》第八十章。原文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2） 见《论语·公冶长》。原文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3） 延安是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安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中心。毛泽东以此来比喻革命和反革命。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三大法宝”为什么灵验

1939年10月4日，《共产党人》杂志创刊，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历史证明，对三大法宝运用自如时，革命力量就会由弱变强，革命形势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三大法宝”为什么如此灵验？我们需要看看三大法宝各自的威力，更需要看看三大法宝结合起来无比强大的威力。

“党的建设”的威力：锻铸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1840年以后，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跌入黑暗和苦难的深渊。为改变悲惨的命运，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但都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自从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的面貌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发挥这样伟大的领导作用？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是“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党性、伟大的领导作用从何而来？一言以蔽之，从“党的建设”而来。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群众的向导发挥领路作用，这是党的政治建设的突出特点。在农民成分的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历史条件下，抓整风学习，进行经常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这是党的思想建设的突出特点。重视民主集中制，深入人民群众之中抓基层组织建设，把支部建在连上，重视遵守纪律，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这是党的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的突出特点。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来提高全党的素质，这是党的作风建设的突出特点。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的“党的建设”

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提高党的领导能力的内容，也是我们党不断自我革命、持续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锻铸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保证党和人民命运与共，这就是“党的建设”的主要威力。有了这个法宝，党才能成为人民的主心骨、定盘星、压舱石，人民才能信任党，坚定地跟党走。另一方面，有了这个法宝，人民才能成为党的靠山、党的根基、党的血脉，才能成为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党才能发挥领导作用。

“武装斗争”的威力：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和主要斗争形式问题

这个“武装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不像俄国革命那样走以城市为中心、城市暴动的道路，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

掌握了这个法宝，就能认清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开展武装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各帝国主义及其分别扶持的军阀都是武装到了牙齿的统治者，日本帝国主义是以武力侵略中国的，国民党反动派是靠武力压制人民的。党要夺取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这就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掌握了这个法宝，就能认清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开展武装斗争：总体来看，是由于中国地域广大有回旋余地。分开来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各帝国主义间接统治和划分势力范围，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党可以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实行红色割据。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敌强我弱，但由于敌小国我大国、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敌人占领的地方，实际力量只能到达城市而不能到达广大乡村，党可以依靠农民建立敌后根据地，开展敌后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不得人心，士气不高，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虽无外国援助，但是通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人心归向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战略防御发展到战略进攻。

掌握了这个法宝，就能认清中国革命在哪里开展武装斗争：概而言之，党是在敌人力量薄弱、地理条件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地方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依靠农民进行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大乡村发动农民建立根据地，进行英勇

的敌后抗战。解放战争开始后，党领导在战略要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惜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求争取达到敌我力量的平衡以及超越。

掌握了这个法宝，就能认清中国革命怎样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敌强我弱，党指挥红军不与敌人搞正规战和战略决战，而是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法，辅之以“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法。抗日战争时期，党通过民主抗战、游击抗战、持久抗战，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打的是正规战；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打的是游击战。此时，毛泽东又将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武装斗争称作游击战争，要大家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解放军由劣势向优势转变，党领导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由占领乡村向占领城市转变，使人民解放军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

没有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就没有党和人民的地位，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武装斗争”的威力。这个法宝是党在建立根据地、依靠农民、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发挥其威力的。毛泽东深刻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统一战线”的威力：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看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在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主要敌人时，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性。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他批评与统一战线策略对立的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工农联盟。党重视工农联盟，重视解决占全国人口 80% 以上的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的革命是农民的革命，农民若不支持革命，革命就搞不起来，就不可能胜利。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强调：“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

统一战线的关键是解决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党重视区别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重视区别买办资产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达到了“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的目标。特别是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既调动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又保护了社会生产力。

走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区别，后者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凝聚起众志成城的力量，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威力。周恩来说：“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这个成就，就是统一战线的成就。

“三大法宝”结合起来才“灵验”，才有无比强大的威力

“三大法宝”从来就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三大法宝”的内容也不是相互隔开的，而是相互贯通、紧密相联的。“三大法宝”结合起来才“灵验”，才有无比强大的威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八周年时，毛泽东总结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党的建设这件伟大的工程应该怎样进行？毛泽东认为应该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联系起来看，联系起来进行。

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毛泽东进一步总结道：“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

器。”“三大法宝”居于第一位的和核心位置的是“党的建设”，党建设好了才能发挥领导作用，才能领导好武装斗争，才能领导好统一战线。同时，“三大法宝”是三位一体的，党的建设基础上的党的领导必须有党领导的军队和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三大法宝”是着眼中国革命特点的、发展的三大法宝，不仅对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京报网 2021年3月22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

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国人民走上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伟大道路。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无数无畏的英雄和不屈的战士。随着斗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步向共产党靠拢，这种现象曾经被人称作是“开万国未有之奇”。

没有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参加和大力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中，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引领的发展道路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形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

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连坚决反共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 1949 年底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在中国不存在抵制共产主义的基础。”虽然他对此并不甘心。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建国方案，而且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创建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 28 年的时间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无数的优秀战士。它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等，许多杰出的将领，如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也都在这场前赴后继的伟大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其中，革命领袖群体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居于首要地位。早在大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大革命失败后，他是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成功革命道路的主要代表。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行动表明了自己是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察民情并依靠群众的坚强的革命者，从而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这一点，甚至也得到了来自国民党营垒的一些人士

的肯定。1949年6月26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他所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国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他说：“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扭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华侨等，都在中国革命斗争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等，即使在最艰苦的年代，也始终坚持革命的立场，与共产党站在一起。邓演达、李公朴、闻一多等，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爱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也都先后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进入20世纪，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斗争，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革命能够赢得胜利，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说过，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堆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些国际友人还直接参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有的已经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经历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两个阶段。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一条根本性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为此，必须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必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中国人民的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没

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必须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第三，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注重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中国共产党首先着重党的思想建设尤其是理论建设，要求党员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努力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培育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创造了整风等新的形式，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由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受到人民真心的拥护和支持，能够使自己不断地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而赢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毛泽东建党学说，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了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坚强的领导核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时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

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国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政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政党制度。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或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其中的国体，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是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标志。几千年来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 100 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各族人民遭受资本—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阶级联合压迫与剥削的历史，结束了国家战乱频仍、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主要的障碍，创造了政治的前提；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不单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是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 1/4 的大国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从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

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在 1949 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时，毛泽东说：在过去 28 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人民，在捍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同时，努力建设新中国，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更加伟大和更加艰苦的道路。

（新华网 2016 年 7 月 26 日）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如何提出来的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同年2月20日，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全文发表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第99期合刊上。这篇文章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一个伟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自觉地承担着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重任。随着革命斗争的展开，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如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应当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在革命中有哪些同盟军可以争取？怎样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准确的回答，以推动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曾作出了许多的努力。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初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从而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1925年，党的四大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1928年，党的六大再次重申，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的革命为“无间断革命”，也是不对的。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已初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同时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应该看到，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还是初步的，而且有的问题虽然提了出来，但并未很好的以之指导实践。由此可见，要成功地解决中国革

命的性质、动力、道路和前途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总路线，形成一套完整的革命理论，并以此指导革命斗争的实践，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1925年12月，他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明确提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他还提醒人们注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待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认为其右翼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朋友。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又率先深入农村，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得出了中国革命可以而且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结论。他还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理论文章，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在进一步总结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系统地提出并阐明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是偶然的。遵义会议之前，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懂得国情不同，革命的性质、对象、依靠力量和方式诸多方面也必不相同，而常常机械地套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来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曾这样讲道，“如果有人问，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么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

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他还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到毛泽东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十多年失败和成功的丰富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我们党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所以，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此时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成果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全国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反动派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都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

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政策调整。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诚心维护的，但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共政治影响的扩大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在军事上制造反共摩擦。就这样，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此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作并发表了上述文章，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建国方略和方针政策，许多人还不是很清楚。新民主主义理论则十分清楚地回答了人们的

关切，它告诉全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现在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直接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就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清晰的革命路线图。这不但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划清了界限，也明确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要走一条独特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个革命的参加者十分广泛，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之外，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还包括作为地主阶级一部分的开明绅士，这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狭隘的工农革命中走出来，成为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地找到了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

（《学习时报》 2020 年 10 月 26 日）

坚持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制胜法宝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实事求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精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

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要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同时还要把握整体，客观认识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深入认识事物内部各个方面、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能够在事物发展的动态变化中认识和把握规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是否正确还要接受实践检验并要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同时，理论只有与实际紧密联系，才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理论如果脱离了实际，就会成为僵化的

教条，就会失去其活力与生命力。理论家如果脱离了社会实践，只是从书本上来到书本上去，就会成为空洞的理论家，而不可能成为党和人民所要求的实际的理论家。”还要把握好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善于研究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不断总结新经验，从而不断从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和生命力。同时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一切从本本出发，或者是从狭隘的经验主义出发，导致主观、客观相分离，理论、实践相脱节。

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方法的实践体现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实事求是作为重要思想方法融入到中国革命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其指引之下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刚刚创建时缺乏经验，理论指导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获得，“样板”也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得到，就拿来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进行尝试，照搬模仿“以俄为师”。但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时，大革命失败、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等等，一次又一次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理性思考，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一个又一个挫折后，逐渐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不断深入，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坚持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才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 1930 年《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共产党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坚持实事求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产生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

1945 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并正式写入党章。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

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和不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靠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不断实践取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哈尔滨日报》 2021年3月24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经历的磨难与挑战

摘要：1921年，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红船中扬帆起航，一路驶来，栉风沐雨，劈波斩浪，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何以历经磨难与挑战而走向辉煌？回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磨难和挑战的伟大实践，对于我们党继续跨越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铸就新的历史辉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正处在继往开来、再攀新高的历史节点。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如何永葆青春活力、实现长期执政、再创辉煌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回看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苦难辉煌无疑是最好的注解。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磨难与挑战的伟大实践

纵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历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历史成就，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过许多磨难与挑战。然而，中国共产党人不惧风险挑战，一次次迎难而上，一次次浴火重生，最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应对大革命失败挑战，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创土地革命战争新高潮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大革命狂飙，我们党也逐渐成长为一个拥有近6万名党员、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政党。但是，正当革命形势空前高涨之际，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相继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残忍杀戮，共产党员锐减到1万余人，工会会员由300万人锐减到几万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迫使全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低谷。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前途渺茫黯淡。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而是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192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又接连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行为作出了最有力的回击，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将起义中保留的革命种子传播到农村的广阔天地，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缔造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奠定了初步的基础。1928年4月，朱毛两军在井冈山会师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方向，成功地实现了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在应对大革命失败的磨难和挑战中，中国共产党找到的这条道路，使几乎陷入到绝境的中国革命获得了重生，迎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高潮。

应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挑战，中国共产党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引领长征走向胜利

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的红军队伍日益壮大，农村根据地也不断扩展，但这一切却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当局的极度恐慌。从1930年10月至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多次发动大规模围剿。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央根据地红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但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直接造成红军第五次“围剿”失败，此后红军节节败退，直至被迫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在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博古和李德又犯了逃跑主义的严重失误，导致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战斗力空前削弱，中国革命再次濒临绝境。

在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消极影响，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领导问题，改组了中央领导班子。遵义会议的召开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为胜利完成长征、进而开创革命新局面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遵义会议后，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指挥下，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摆脱了几

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包围追击，并最终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胜利结束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是我们党在领导革命过程中的又一次磨难与挑战。但这一切肤之痛，也让我们党意识到，实行“左倾”教条主义不可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重任，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决策机制。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革命局势的变化，肩负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使命担当。

应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挑战，中国共产党率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族抗日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逐渐沦陷。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加紧侵略华北，将历尽灾难的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当此历史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主动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从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根本目的出发提出了正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政策。而此时执掌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却依然顽固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把主要精力放在“围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遇到了很大阻碍和挑战。

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以及既不敢公开放弃抗日、又不敢与共产党彻底破裂的动摇妥协性，中国共产党采取既合作又斗争的政策，积极倡导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郑重宣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向全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12月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明确提出，党的新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起到了定方向、开新局的关键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使得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重大转折点。“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日本侵略军的步步紧逼和全国人民反内战浪潮的推动下，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

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负责主导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支援、通力合作。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力量的联合激活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全国四万万民众以昂扬的革命斗志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革命洪流中去，自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团结抗敌的崭新局面终于实现。

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吞并中国的嚣张气焰和猖狂进攻，抗日战争取得了近百年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

应对全面内战爆发挑战，中国共产党发动人民解放战争，加速中国革命胜利伟大进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拒绝和平民主要求，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悍然发起全面内战。当时，国民党军队拥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 430 万人，控制着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地区和绝大部分现代工业，而人民解放军只有 127 万，解放区大部分地区经济落后、资源匮乏。在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重大历史关头，在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面临着严峻挑战。

中国共产党敢不敢以革命战争迎击反革命战争？人民解放军能不能在战争中打败国民党反动军队？这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毛泽东同志客观而全面地估计了整个形势，鲜明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使中国人民树立起革命必胜的信心。军事上，党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对解放战争时期全局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战争的战略战术起到了有效的指导作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充分发动群众，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在各个解放区开始了一场彻底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运动。这一运动使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迸发出极大的保卫解放区、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壮观的爱国民主运动，并逐步形成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仅仅三年多的

时间，中国共产党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其进展之快、影响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经过解放战争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对革命军事规律的把握和运用上，还是对人民群众的动员与组织上，还是在对党的自身建设上已经是一个高度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人们期盼已久的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磨难与挑战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跨越磨难与挑战的精神密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经受住磨难的根本支撑和磨难中奋起的强大精神支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的重大风险和严峻挑战前所未有，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长期存在，更加需要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战胜磨难与挑战的道义追求与牢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回顾百年党史，充分说明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最伟大的力量蕴含于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为民造福，无论面临多大的磨难和挑战，从来没有动摇过、放弃过。所以，在党遇到困难的时候，人民始终积极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成为党奋力前行的牢固根基。在当下的疫情防控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成为中国抗疫斗争最醒目的价值导向，紧紧依靠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战胜疫情的巨大优势，这些无不再次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理念的强大魅力。

正视问题、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超越磨难与挑战的不竭动力源泉。正视问题、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其实质是自己反思自己，自己发展自己，充分展现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和作为中国坚强领导核心的强大革命气魄。翻开风云激荡的革命篇章，正因为我们党始终秉持正视问题、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才能一次次在危难之际中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变革，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因此，党要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更加需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新跨越。

居安思危、知危图安的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磨难与挑战的政治自觉。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与生俱来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可以说，经过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与考验，忧患意识已经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液，成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回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烽火岁月，正是居安思危、知危图安的忧患意识使共产党人一次次转危为安、化危为机，在危与安的转化中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处于各方面风险集中显露的时期，始终保有一份居安思危、知危图安的忧患意识是我们党在复杂的执政环境下保持头脑清醒、沉着应对的重要支撑。

（人民论坛 2020年7月15日）

党史上的这一周

(4月5日-4月11日)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选取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党史百年·天天读》栏目中的“重要论述”，集中展现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和理论观点，供学习参考。

4月5日

1929年4月5日

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复信批评中央二月来信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是错误的，并介绍了红军的战术，明确了红军的任务。复信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其实，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关于红军的战术，复信还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

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关于红军的任务，复信指出：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0年4月5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电报指出：蒋介石有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我不入华中不能生存。此次蒋令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电报还提出：华中地区，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德、彭德怀及刘少奇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刘少奇负责，会商黄克诚、彭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德、彭德怀及中央军委。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41年4月5日

刘少奇写信给陈丕显并转各地委同志，强调要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信中指出：我们要建立巩固的苏北抗日根据地，除开军事问题以外，民众的组织与武装及其抗日积极性的发扬，就成为我们建立根据地与长期坚持抗战的基础，所谓“兵民是胜利之本”，也就是这种意思。只有民众起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卫国家民族。因此，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解除民众中若干迫切的疾苦，就成为我们目前发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与提高民众民族觉悟、阶级觉悟的中心一环。

1943年4月5日

毛泽东和朱德致信印度国民大会。信中高度评价柯棣华大夫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及中印友谊，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贵会派遣了一个援华医疗队来华参加中国的抗战，表示对华的极大友谊。四年以来，医疗队诸同志不避艰险，辗转北方战地，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极有价值的

工作，使无数中国军民亲睹印度人民的援华热忱。柯棣华大夫因病逝世于晋察冀边区，我国军民失一良友，印度人民失一优秀战士，至堪悼惜。现巴思华大夫返印，特向贵会及印度人民敬致谢意！

1979年4月5日—28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一九七九年起用三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广东省委的这一要求。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4月6日

1936年4月6日

毛泽东和彭德怀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电报说：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即延安）与张学良会商救国大计。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本帝国主义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九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教堂内举行会谈，就上述五项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张学良提出希望争取与蒋介石合作抗日，周恩来表示愿将这一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1982年4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阐述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指出：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如果中国一九九七年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4月7日

1955年4月7日

刘少奇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难先复信，强调监督的重要性。信中指出：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以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的监督。这封信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957年4月7日

刘少奇在听取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等汇报商业、税收工作时，谈话指出：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的缺点，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搞大的项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这可以使我们发现问题，逐渐把计划工作做得周到一些。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更完善，有多样性。税收不是简单收几个钱的问题，首先是考虑生产，其次是调节人民生活。要由有眼光的人去研究，必须多方面考虑，片面性会出毛病。本月二十七日，他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谈到自由市场问题。讲话指出：要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讲话还强调：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个体制问题。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二十七日的讲话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990年4月7日

邓小平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提出，中国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稳定和发展。他指出：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

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否则社会稳定不了。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四个坚持，就没有稳定，改革开放也是空的。搞社会主义，也允许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存在。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振兴中华民族》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4月8日

1949年4月8日

毛泽东复电李宗仁。电报指出：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1957年4月8日

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关于勤俭建国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一是应该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的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倡增产节约，反对贪大贪新。二是应该面对群众的需要。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对于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解决群众需要的问题，甚至有些不花钱也能解决的问题，却注意得不够。关于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问题，报告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应该特别警惕。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个方面的监督，我们就

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这个报告分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1980年4月8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总裁麦克唐纳时，就三机部同道格拉斯公司的合作事宜指出：我们双方在航空工业方面的合作，要从战略上加以考虑，而不仅仅是做生意。会谈结束后，对陪同会见外宾的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说：民用飞机总得在国内自己生产，不能一直向外国买。

同日 他在会见马来西亚文化代表团时说：六十年代，我们科学技术水平同国际上比有差距，但不很大，耽误了十一二年后，这个差距就很大了。因为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是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现在我们开始寻求一条好的道路来弥补过去的损失。

4月9日

1936年4月9日

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电报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大原则，反对拦阻红军抗日与捣乱抗日后方。无疑的，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1938年4月9日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讲话指出：你们在这里学习，可以学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全中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具体地说，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几样东西：第一，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

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第二，要学做干部。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干部要把成千成万的广大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这广大的有组织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你们要把握紧正确的政治方向，经过你们传播这政治方向于广大的人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同时你们也要传播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使广大民众都能坚定地不动摇地与任何困难奋斗。你们更要以灵活的战略战术教育广大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而且都会打日本。组织全国人民，训练全国人民，是要靠你们这些干部的。第三，要下定不怕任何艰苦，不怕牺牲，向前迈进的决心。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

1947年4月9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通知指出：国民党采取召开伪国大、宣布国共破裂、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等项步骤，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其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在上述情况下，中央决定：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这个通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之二。

1986年4月9日

邓小平在会见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时指出：南北问题不仅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现在贫穷的国家太多了。如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发达国家的

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因此，不解决南北问题，人类的发展将遇到困难，这将是一个全球性和长期性的问题。

4月10日

1923年4月10日

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文章指出：现在国内存在三派势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的军阀派。今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以下情况：一方是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非革命的民主派），为了推倒共同敌人与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其原因，一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最便利于军阀的统治。文章还指出：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也就是说，更反动更混乱的政治，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34年4月10日

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所得结果基础上，综合其他乡苏维埃工作经验，写《乡苏怎样工作？》一文，以指导乡苏维埃政权建设。文章指出：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文章阐述了许多重要的工作方法，包括要懂得抓紧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不应该只忙一些零碎事务，把中心工作丢掉了；要根据各村的情形和特点去推动工作，解决各村群众的困难问题；要废除一切强迫命令的方法；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

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8年4月1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转许世友、谭震林、谢有法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电报强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指出：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合乎中国革命形势的要求的。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1956年4月10日

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时，讲话指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

陈云在会上讲话指出：订计划应该遵循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如果基建规模超过生产发展，就会出问题。以后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然后再进行财力平衡。另外，大规模的建设，必须要有储备，特别是木料、钢材、水泥等的储备。否则，建设中碰到问题就无法解决。

1974年4月10日

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发言指出：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

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发言强调，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他们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

发言还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六项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授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1980年4月10日

邓小平在会见日中青年研修协会友好访华团和日本东京青年会议所访华团时说：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日本企业中百分之九十是中小企业，我们中小企业也是大量的。我们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学习日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中小企业的经验会对我们有帮助。中国过去学习苏联的企业管理方法，许多企业追求大而全。现在，有些地方搞试验，把一个厂分成几个厂，搞专业化。凡是这样做的都见效了。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努力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尽可能延缓战争爆发的时间。从全球范围来说，中日关系搞好，是件大事，是重要的稳定因素之一。中日两国人民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中日两国友好不仅对两国人民有利，而且有利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世界

的和平。希望两国青年、儿童懂得中日友好的重要性，把两国友好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

1981年4月10日

邓小平在会见瑞典首相费尔丁时说：中国一贯的目标就是争取和平。中国很穷，最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因此，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的。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对付霸权主义。实现和平的手段，就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更长时间的和平。

4月11日

1944年4月11日

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这篇报告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与主持下由谭政起草的。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正在从政治工作的方向、制度、作风对部队进行全面的检查。初稿写出后，毛泽东作了修改，加写三千字左右，主要阐述共产党的军队与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二十日，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学习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的通知，

指出：这个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们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

1950年4月11日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讲话。讲话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